

湘西春秋

2006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共党史回忆资料丛书

第七辑

湘西自治州中共党史联修组
中共湘西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
保靖县中共党史联络组
青阳县史志办公室
合编

湘西春秋

顾 问: 黄有为

本辑编委会: 张国祥 向光耀 刘金生 孙树
彭正川 梁君生 何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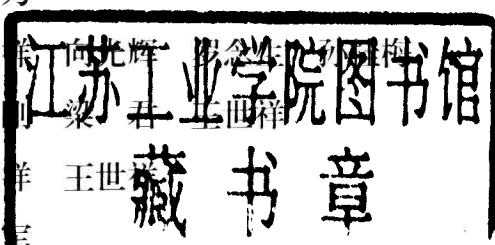
主 编: 张国祥 王世军

副 主 编: 唐祖军

编 辑: 叶立宏 邹志高 侯先祥 周兰芳

贾长金 田 彦 王吉平

校 对: 邹志高 侯先祥 唐祖军 周兰芳



中共湘西自治州委党史研究

湘西自治州中共党史联络组 合编

保靖县史志办公室

保靖县中共党史联络组

2006年10月

序

中共保靖县委书记 龙靖波

曾经沧海，多难兴邦。建国以来，57度风雨，57年征程，57载辉煌，保靖已成为缀饰在湘西大地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回眸历史，这里，曾是一片红色的土地，革命烈火燎原酉水沿岸。大革命时期，就有米世珍、姚彦等革命先驱最早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熏陶，走出大山寻求革命真理，成为李大钊的亲密战友。20世纪30年代，许多土家、苗、汉好男儿前仆后继，参加红军，为中国革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丽凯歌。40年代，进步学生团结御侮，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走上街头抗日救亡。解放初期，一批外地干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离别家人，远离故土，奔赴保靖，开展轰轰烈烈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运动，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保靖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放眼未来，这里是一方充满希望与梦想的热土。如今的保靖已以她的开放、飞速发展引人注目。因为这里不仅有丰富的资源，更有良好的投资环境。近年来，全县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求真务实、敢为人先、团结奋进”的保靖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工业化总揽经济工作大局，突出“又快又好发展”这一主题，围绕“小康保靖”、“和谐保靖”两大目标，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三大进程，着力加强优势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事业四大建设，牢固确立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核心地位，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就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编写老干回忆录,不仅是党的历史知识的宣传教育,也是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老一代牺牲奋斗的成果,需要青年一代去巩固和发展;老一代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需要青年一代去继承和发扬;老一代为之奋斗的美好未来,需要青年一代去追求和实现。广大群众要像我们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目 录

序 龙靖波(1)

永葆先进性

活学活用党的历史	连瑞珍 (3)
跟“副七品官”下乡	龙明静(13)
矢志为党工作 永葆党员本色	石昌凡(16)
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田兴中(22)
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麻顺绪(25)
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	胡传正(31)

人物春秋

刻在记忆深处的永恒

——深切怀念培民同志 孙岱毅(39)

我心中的丰碑

——忆彭司琰同志 彭华茂(45)

红军的传统 人民的本色 符富全(54)

历史的回忆 有益的启示

——忆章桂同志的农村工作经历 陈天一(58)

细微深处见高尚 杨安位(62)

竭诚旱粮科研 造福山区百姓 彭剑秋(66)

一位普通共产党员的归宿

——怀念我的叔叔贾延寿 贾昶(73)

剿匪迎解

保靖县城迎接人民解放军	黃悠荃(79)
惯匪头子“贾辣子”归天记	陈克君(81)
匪首谭森之死	杨春(90)

人民公社化运动

泸溪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王荣湘(99)
泸溪县兴隆场人民公社的建立	李春潮(102)

党务工作

文秘人员合理流动与增强办公室活力	石英伯(107)
选举	胡泽文(110)
回忆三件事	胡泽文(114)

经济建设

以“三优”搞活边境贸易的回顾	石英伯(121)
促进我州横向经济联合大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阳尔玉(128)
吉首大搞山地开发情况	何启茂(134)
坚持走群众路线 夺取粮食大丰收	向仕银(137)
飞播造林	廖哲求(140)

水利·交通

修建岩门溪中型水库	吴文海(147)
战斗在龙塘河水库大坝的日日夜夜	隆宪清(152)
兴修兄弟河水库和建设口粮田的回顾	向明喜(156)
卡棚水库建设追忆	向锡洋(162)
峡谷明珠	伍启明(169)
凤凰县第一条公路 ——吉凤公路的修建	吴荣卓(178)
“以工代赈”头三年保靖公路交通建设的回忆	吴大奎(181)

文化·教育·卫生

在吕洞山区架设广播专线的日子	彭华茂(191)
保靖县档案馆历史档案的整理与开放	吴伯文(194)
写在高山急水间 ——关于龙山县教育改革的回忆	曹振怡(199)
从教四十年	谭子超(205)
在保靖民中当支书	张孔敬(210)
我的点滴回忆	龙金香(215)

公安·统战

人命关天	王德松(221)
智破谋杀案	王德松(226)
情倾统战工作	胡晖(234)
落实统战政策的回忆	张大军(242)

民族团结 世代相传 彭南楚(248)

往事珍闻

在花垣县委工作十年的感受	龙爱东(253)
“文革”之前征战急	陈秀实(262)
难忘的岁月	王牧夫(278)
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	贾 祥(280)
苦日子的最后一年	田兴中(283)
我经历的几件事	宋官林(287)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	刘炳文(293)

其　　它

尊老敬老是我的心愿	向大诚(301)
退休生活二三事	谭子超(30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覃兴恬(316)

后 记 (322)

永葆先进性

活学活用党的历史

连瑞珍

我参加工作 57 年的革命经历告诉我，个人的革命经历就是学习党的历史、实践党的历史的过程。在参加革命以前，我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也不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更不懂得什么是为人民服务。1949 年 2 月下旬，我考入新型的“抗大”式的大学——中原大学。在三个多月时间里，我学习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毛泽东思想，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党的基本知识课程。通过学习，我们学员在政治思想上很快发生了深刻变化，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决心成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忠实革命者。同年 6 月 12 日，我们这批学员在中原大学毕业后，多数人都随军南下，到湖南开辟新区工作。我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行军，终于在 1949 年 10 月 18 日到达永顺专署工作。从此，我便在湘西扎下了根，在湘西土地上几十年如一日地学习党史，为党争光彩，为民谋利益。学习党的历史，实践党的历史，我有几点体会：

一、坚持认真学习，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是不断开拓进取的保证。1950 年 3 月，永顺专署机关由永顺迁到保靖县城不久，专署领导为了平抑市场物价和改善机关干部生活，决定用干部的包干经费在保靖城内开办一个机关合作社。专署领导要我负责合作社的全面经营，时代同志负责会计和日常营业，范永在同志负责商品保管和赶场日在门市部帮助卖货。

由于我们三人都没有做过生意，更没有卖布的经验，时代同志

头两天卖布竟把一匹龙头细布卖少了一丈多。当时合作社由专署财粮科直接领导,我便把这事报告给科长张国权。第二天晚上,他特地到合作社同我们三人谈话。他微笑着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为啥把布卖丢了。卖布是有学问的,过去我在老解放区卖布时,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问题在于你们卖布用尺量时,没有把布拉直拉紧,上下尺弯又留得太大,所以把一百多米的一匹布卖少了一丈多。”听了张科长这番话,我们顿然醒悟。时代当即答应:“一定按科长讲的去做。”第二天他卖布时不但把布绷得又紧又直,而且把尺弯打得很紧,结果一天下来,不但没有卖少,还多出五六尺来。他高兴地把这事告诉张科长,张听后不但没有表扬他,反而还十分严肃地对他说:“你这样做不好,我们做生意也是为人民服务,买卖要公平,不能坑害群众,把布绷得太紧就不够尺寸了。你们可不要小看这分分寸寸,这不仅是卖布的经验和技巧,而且是衡量我们的目的与感情的一种标准。”我听了张科长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不但感到对我们年轻人教育很大,而且使我铭记在心,成为我一生认真办事的榜样。我们就这样边做边学,不仅很快学到了经商的一些基本知识,而且更深刻地理解到:做生意坚持公平交易原则,就是维护了人民利益。

1951年秋,永顺专区开展土改运动,专署机关也抽调一批干部,由我带队到永顺一区参加土改工作。我们这个土改工作组全是年轻人,既没有土改经验,又缺乏社会知识。我于1951年上旬在沅陵湘西区党委召开的湘西区第一次党代会上学习过十多天土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基本作法,其他队员只是在县里七天集训土改工作队时学习了有关土改工作的基本知识,根本就不知道具体的土改应该如何搞。

9月下旬,我们工作组到达永顺一区勺哈以后,经与区委研究,由区委第一书记李晓和副校长王中定负责领导区政府附近五个乡的土改工作,区委书记金同心和我负责领导首车、里列、两岔

等五个乡的土改。入村前,我们根据“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领导有区别地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由点到面,点面结合,分期分批,开展土改运动的方针”,经工作组全体成员讨论,决定入村后第一步要办三件事:(1)召开群众大会,说明来意,向群众宣布工作组的任务;(2)广泛宣传政策,让群众知道划分阶级的主要政策界限,如何区别劳动与剥削;(3)深入发动群众,工作组到村要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生活劳动中接近群众。工作组进村与群众接触几天后,发现群众顾虑很大,不敢接近我们,更不敢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为了摸清群众的主要顾虑是什么,我一方面深入群众多方了解情况,另一方面经常抽空认真学习当时中南局编印的《土改工作通讯》。这本小册子每半月出一期,它不仅登有土改的方针政策、每步作法,还有经验介绍和分析文章,对土改工作很有指导意义。当我摸清群众不敢接近我们的主要原因是怕“变天”,担心工作组走后,地主反攻报复后,为以实际行动解除群众顾虑,我经请示县委书记王彩章批准(当时县委书记有批准杀人的权利),在里列乡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布镇压一个恶霸地主和一个有血债的匪首。会后,贫下中农很快被发动起来,我们开展诉苦运动,组织贫农小组,建立乡农民协会,划分阶级,适时开展对地主的说理斗争,然后分田地立标界。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胜利完成了第一批土改任务。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边做边学取得的成绩。此后,我在四十多年的工作中,都坚持做什么学什么,不论干那一行都能做出显著成绩。

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是搞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从我亲身经历的一些政治运动可以看出,不论何时何地何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否则,就必然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1954年,为了防止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敌对分子从内部

进行破坏活动，党中央决定从 1954 年秋开始在国家机关内部审查干部，在审干的基础上再进行内部肃反运动。县以上各级党委都要建立“五人小组”，专门负责领导审干和肃反工作。我当时被州委抽调到州政府机关审干办公室，负责审查政府机关各部门的干部。这次审干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准诱供逼供。有时为了查清一个干部的历史问题，不惜派多人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作出结论后，还要征求本人意见，看是否属实，如有异议，再行调查，调查工作很是深入细致。1956 年春肃反开始时，州政府机关审干办公室接到一封检举信，说 ×× 曾在其家乡参加过某特务组织。我向机关“五人小组”组长张国权（时任副市长）汇报后，他对我说：“这个问题，你要带人亲自调查才行。”我当即表态说：“张副市长，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个人的问题调查清楚。”不久，我就和另一同志（按审干规定，外调必须两人同行）一起到被检举人的家乡安庆、芜湖一带调查。我俩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查证了她父亲确系中统特务，其领导的特务组织人员档案，均未见被检举人的名字。我们又调查了她的同学、亲友和其父亲手下的特务人员近百人，都说她没有参加其父的特务组织。最后我们又到一所监狱找到了检举人，问他有何证据说 ×× 是特务分子，他说：“我在她家开会时，见她给我们倒茶。”“那你见她参加过你们的会议没有？”他答：“没有”。我们调查的这个人，那时还在读中学，按年龄也不可能参加特务组织。我们调查回来，向机关五人小组和州委五人小组汇报后，均同意否定其特嫌问题。实事求是是一直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负责审查的州政府机关 18 个部门近 150 名干部，没有出现一个冤假错案。

然而十年后，即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却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

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普遍受到批斗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很多经历了长征和抗日战争的老党员,一夜之间被打成“叛徒”、“内奸”或“假党员”。各级领导干部都被诬蔑为“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一些正直的群众,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如州医药公司的干部陈仲彬,只是因为在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时候,她不仅没有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反而义正辞严地反驳说“刘少奇同志是人民的勤务员”,就给她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把她整得遍体鳞伤,直到 1980 年 4 月 10 日才为她召开平反大会,重新安排工作(她的动人事迹曾以《捍卫真理的好干部》一文被编入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的《春风细雨》一书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方面反映出来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可谓教训深刻,本应吸取教训,不再重犯。但七年以后,在州直机关进行机构改革时,我又亲眼看到(当时我任机构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州委常委、组织部长朱光庭兼任主任)不少同志又自觉不自觉地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时落实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上级规定了一些具体杠杠,如年龄关规定新提的局级领导干部一般要在 45 岁以下,50 岁以上的不再提拔;文化关规定一般要从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中选拔局级领导干部,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不能提为局级领导,德才特别优秀、而年龄在 50 岁以上或文化在初中以上,要提为处(局)级干部须报经省委批准。这次机构改革,实际上是在新时期进行的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干部制度改革,经将近一年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是提拔了一大批文化高、知识广、有朝气、有能力的

年轻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开始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实行后备干部制，注意选拔培养栋梁之才。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缺乏经验，加上领导思想上的片面性，在选拔领导干部中，单纯看年龄、看文化，因此工作中就出现了一些不实事求是的倾向：如重文凭，轻水平，提了一些不称职的人；过多地下了一些有水平、有实际工作能力、年龄偏大的老同志。实践证明，对干部的选拔任用，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一刀切，不能只看表面。有的人四十多岁，但常患病，身体很弱；可有的人虽然已上五十岁了，但身体强壮，仍能从事繁重的领导职务，你能说他不能用了吗？有的人学历高，在技术岗位上是“尖子”，但到了领导岗位上后，他却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必须因才施用，因人而宜，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三、坚持与时俱进，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5 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保证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所经历的曲折发展过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个真理。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与时俱进，在湘西州境内完成了剿匪任务，肃清了百年匪患，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恢复了经济，稳定了物价，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巩固了新生政权。1951 年冬还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同时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6 年 9 月党的第 8 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

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可惜在后来的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背离了“八大”提出的任务和前进方向，犯了严重错误，以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57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炼钢铁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还提出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事”等错误口号，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生产建设受到很大损失。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并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所谓的反党集团，进而在全国错误的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州人民群众多处于缺吃少穿状态，很多县乡干部都得了水肿病，不少贫困农民因饥病交加、无力救治而离开人世。据当时统计，那三年全州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8万余人。

1963年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1964年至1965年间，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